

台湾农村发展的进程、模式和趋势

项文惠*

摘要：本文采用相关统计数据，描述了21世纪以来台湾农村发展的进程。将其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增长型、内外交互作用型三个一级模式，并细分为城镇扩展带动型，劳务输出反哺型，新型、特色农业发展型，土地活化推动型，农村社区再生型，休闲农业深度旅游经营型、农村市场组织型七个二级模式。最后从农业发展的压力、农村衰退的走势、农村存在的矛盾的“不变”和农业转变为“农业+”、农村发展模式转变为“三位一体”重构体系的“变”的角度，分析了台湾农村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台湾农村；发展模式；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F32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1)04-0080-08

DOI:10.13818/j.cnki.twyj.2021.04.008

在经历了两次经济转型尤其是21世纪“三生”政策从营造农村新风貌到新农业运动、再到农村再生的渐进过程，台湾已经步入现代农业的新阶段，农村发展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明显重构。本文旨在回答21世纪以来台湾农村发展的现状与推动农村发展的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台湾农村发展的进程

(一) 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产值变化

近十年来，台湾生产总值持续增长，GDP从2010年的14889912百万元新台币（以下若无说明，均为新台币）增长至2019年的19139231百万元，年均递增2.83%。三次产业产值同时发生变化，第二、第三产业增长，其中，前者年均递增4.01%，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者年均递增2.33%，但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产值从2010年的374321百万元下降到2019年的363852百万元，年均递增-0.15%，比重则从2001年的3.62:24.52:72.94、到2010年的2.51:33.29:63.94、再到2019年的1.9:36.8:61.16(表1)。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和农业产值及其比重持续下降，反映了台湾农业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相应下降。

表1 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单位:新台币百万元,以2016年为参考年)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0	14889912	374321	4957413	9520441	2015	17183235	362488	6238918	10614868
2011	15436975	391486	5248378	9821638	2016	17555268	327502	6472113	10755653
2012	15779909	378937	5491844	9946993	2017	18136589	354585	6779536	11067061
2013	16171821	384952	5658364	10166433	2018	18634482	370494	6996747	11388089
2014	16935007	392823	6183034	10486247	2019	19139231	363852	7042640	11705582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 作者简介：项文惠，男，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教授、旅游与休闲研究中心负责人。

（二）农村人口就业变化

21世纪以来，台湾农村人口持续下降，从2001年的3783千人下降到2016年的2818千人，年均递增-1.87%，加之第一产业产值贡献率的下降，吸纳的就业人员也相应下降，农村人口中农业就业人员人数从2001年的706千人下降到2019年的559千人，年均递增-1.32%，比重除2015年是20.57%外，均不到20%。此外，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农业就业人员在下降到535千人的最低点后反弹，总体呈增长趋势，年均递增0.45%（图1），台湾农村再生培训社造人才参与社区建设尤其是吸引年轻人回乡的政策效应初现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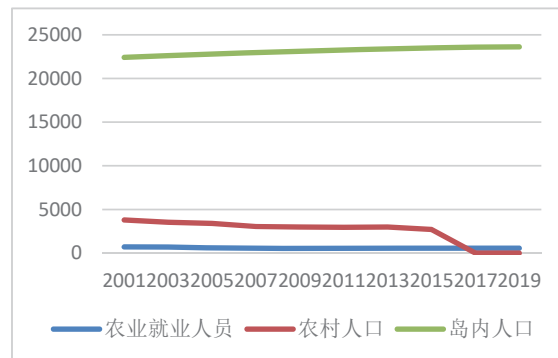


图1 农业就业人员、农村人口、岛内人口 (单位: 千人)

资料来源: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三）城镇化进程

2001-2019年，台湾人口持续增长，人数从22406千人增长至23603千人，年均递增0.29%。同期农村人口持续下降，占岛内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12%（图1）。农村人口持续下降和向城市集聚，是城镇化推进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2001-2019年，台湾耕地持续下降，面积从848743hm²下降到790197hm²，年均递增-0.48%，虽未使都市土地明显增长，但在已登记的非都市土地中，除农牧、林业等直接生产用地外，比重排序前四位的“国土”保安用地、建筑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地持续增长，年均分别递增11.56%、0.47%、0.83%、1.23%，其中，“国土”保安用地增长最快，面积从42997hm²增长至247095hm²（图2）。农地虽未直接成为产业和居住的用地，但呈现非农转移的趋势，渐为城镇生态修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形成台湾城乡用地的新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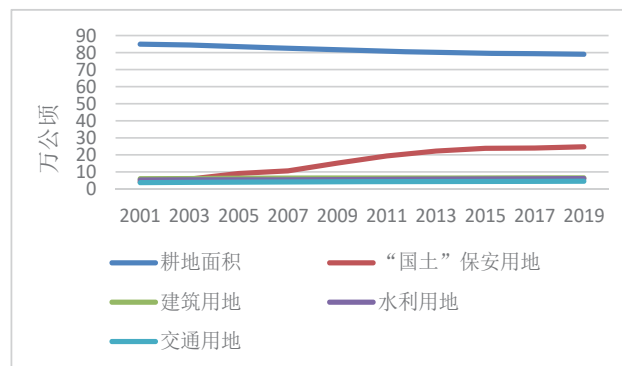


图2 耕地面积、“国土”保安用地、建筑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地 (单位: 公顷)

资料来源: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四) 农业就业人员收入变化

台湾农业就业人员收入增长较快,2007-2016年,从平均每户年收入937053元增长至1073142元,年均递增1.59%,高于同期工业0.99%、服务业0.42%平均每户年收入的增长速度,但规模不及工业、服务业平均每户年收入(图3)。尤其是其净收入虽从180562元增长至234067元,年均递增3.13%,高于同期非农收入1.7%的增长速度,但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只有20%,非农收入却占80%左右(图4)。反映台湾城乡收入存在差异,农业就业人员从非农经济获得了较之于农业经济更多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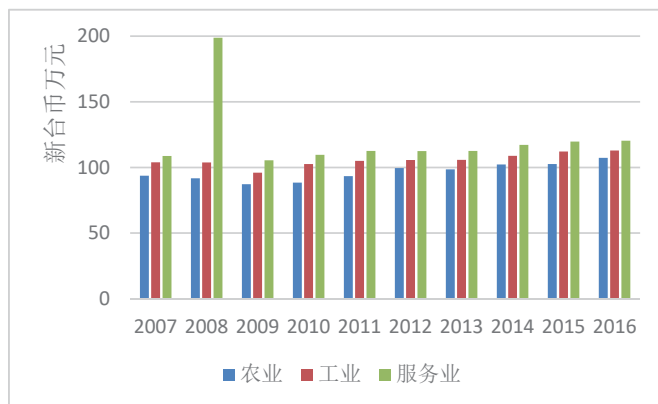


图3 农业、工业、服务业平均每户年收入(单位:新台币元)

资料来源:①农业平均每户年收入根据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重要农业统计数据清单》相关数据绘制②工业、服务业平均每户年收入以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每人每月平均薪资为基础、按每户平均两人就业计算并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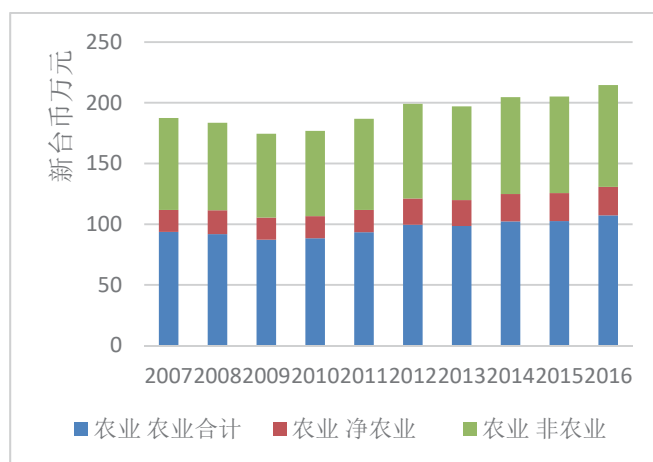


图4 农业平均每户年收入之净农收入、非农收入(单位:新台币元)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重要农业统计数据清单》相关数据绘制。

二、台湾农村发展的模式

台湾地形独特,中间高、两侧低,2/3为山地、丘陵,耕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1/4,但因地处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曾有“海上米仓”、“东方甜岛”、“水果王国”等美誉。在经历两次经济转型后,基于城乡空间结构小城镇、大郊区的格局,得益也受制

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和“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形成了诸多富有区域典型特色的农村发展模式,成为推动农村演化和重塑的载体和支撑。

农村发展模式是从理论上对不同区域农村发展进程中,具有鲜明特征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的高度概括。台湾有哪些类型的农村发展模式?本文采用动力源差异性(分外援驱动型和内生发展型)^[1]、行为主体(分政府推动型和民间推动型)^[2]、产业发展方向(分农业主导型、工业带动型和商旅服务业主导型)^[3]三种主要农村发展模式分类标准的第一种,从其形成和变化的影响因素切入,将台湾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增长型和内外交互作用型三个一级模式,分别表现为明显的以工补农、城市带动农村,在地资源、农村自我发展和既依托自身优势、又借城镇化推动的特征。同时基于21世纪以来台湾农村发展的实践尤其是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的差异,如,主要分布在中部的山地积累了农村人口外移、自我发展能力下降等矛盾,分布在五大山脉两侧的丘陵虽存在农村人口外移的问题,但旅游和农业具有潜力,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的平原除第一产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外,还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机遇,分布在三大都会区边缘的农村因接近与其频繁交流的城市,是城市的后花园、蓄水池,将台湾农村发展模式细分为城镇扩展带动型,劳务输出反哺型,新型、特色农业发展型,土地活化推动型,农村社区再生型,休闲农业深度旅游经营型、农村市场组织型七个二级模式,并归入相应的一级模式(表2)。

表2 农村发展模式分类及其描述

一级模式	二级模式	基本特征	形成机制	实践表现(或典型案例)
外援驱动型	城镇扩展带动型	城镇边缘农村扩展为建成区,带动村镇空间变化和农村人口的非农转移	都市郊区化的影响,产业和居住用地的需求	卫星村镇(主要分散在台北、基隆、桃园、中坻)
	劳务输出反哺型	农村人口输出转移,收益、技术、观念反哺农村	人力资源丰富,区位、土地欠缺	山地、丘陵和传统农业区农村人口外移(南投、云林、嘉义、屏东、台东、花莲)
内生增长型	新型、特色农业发展型	培育新型农业;依托在地资源,围绕某一特色产品或产业链,开展规模化、专业化种植、养殖、加工、经营,实现农村自我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资源条件良好,有种植、养殖、加工、经营某一特色产品的传统	高附加值(屏东农业、台南兰花等生物科技园区)、节能节水(云彰嘉高铁沿线黄金廊道)、有机(草屯、复兴里良质米)、精致(彰南、溪口花卉)、智慧(宝山智慧、五峰智能等示范农场)、创意(梅子梦工厂、蘑菇部落)等农业;台湾茗茶(鹿野乌龙茶、鱼池森林红茶)、农村美酒(玉山高粱酒、信义马拉桑酒)、竹制精品(竹山)、金钻水产(布袋虱目鱼)、优质畜产(土鸡、珍猪)
	土地活化推动型	活化土地,农村经济变农业主导型为非农主导型	地缘、环境、投资、政策条件	村镇工业(鹿草工业园区);土地出租(林边、佳冬“养水种电”,市民农园)
	农村社区再生型	培训社造人才,引导由下而上自主参与社区建设	政策推动和多个行为体参与	人、文、地、产、景的总体营造、永续经营(永安、桃米)
内外交互作用型	休闲农业深度旅游经营型	依托农业旅游资源,以旅游产品为吸引物,通过休闲农业的深度经营发展农村经济,改善村容村貌	生态环境、田园景观、乡村文化、产品基础、政策支持	农业遗产(桃园台地陂塘、乌山头水库及嘉南大圳)、乡村节庆(丰年祭)、休闲农场(走马濑、香格里拉)、休闲度假(枕山春海、南投丰年)、田园餐饮(飞牛牧场、薰衣草森林)、主题民宿(五结、庄脚所在)、平地森林游乐区、休闲渔港
	农村市场组织型	组织以农产品交易为中心的农村市场	区位优势、特色资源	农夫市集

三、台湾农村发展的趋势

2019年,台湾创建“地方创生汇报”机制,推行“地方创生战略计划”,意味着农村仍在“不变”中求“可变”。不变指台湾正遭遇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不断下降的挑战,未来若干年内,构成农村发展的某些基本矛盾不会发生逆转;可变指农业作为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育的根基,因具有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生态屏障、促进城市发展等功能,在自身演化、重塑后,仍将是台湾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 不变方面

1、农业发展的压力不会变。农业作为台湾三次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受产值、比重及其对生产总值贡献率的影响,在市场化竞争中仍将处于劣势地位,发展面临很多困境。第一,活化休耕农地、保障粮食安全是台湾首要战略性难题,虽然实施“调整耕作制度活化农地计划”、“大粮仓计划”等,推动休耕农地扩大种植杂粮,但未扭转粮食安全“不足中的过剩”,基于热量计算的粮食自给率仅在30%-40%间,是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地。^[4]故此,稻米严重过剩和玉米、小麦、大豆等杂粮高度进口依赖的现象仍将长期存在^[5],农地复耕和粮食自给的压力加大。第二,还在上世纪末,台湾已开始注重农业资源的生态保育,在生产方式调整中表现为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一定控制,其中,化肥生产虽总体呈增长趋势,从2010年的1352858t增长至2019年的1550031t,年均递增2.04%,但化肥施用却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1030819t下降到2019年的837412t,年均递增-2.23%。农药使用总体呈增长趋势,从2010年的7851t增长至2019年的8983t,年均递增1.88%(表3)。故此,化肥施用将持续下降,十年内有望减少一半,但受高温多湿、病虫草害影响,农药使用不会下降,“农药王国”将继续存在。^[6]农药残留成为食品安全的源头,是岛内居民普遍关注的焦点,农业资源利用与生态保育甚至食品安全的矛盾突出。第三,随着台湾耕地面积持续下降,优质耕地相应减少,尤其是平均经营规模仅1.1hm²,属于小农家庭式生产形态,细碎化现象严重,阻碍大型农业机械化使用及与岛外工业化大农业相竞争^[7],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稳定、增加粮食安全风险。

表3 化肥生产、化肥施用、农药使用(单位:吨)

	化肥生产	化肥施用	农药使用		化肥生产	化肥施用	农药使用
2010	1352858	1030819	7851	2015	1195553	959623	9295
2011	1463569	1008025	8254	2016	1267510	979215	9504
2012	1417442	1010722	9396	2017	1607175	920965	10549
2013	1467269	999908	9632	2018	1561067	917417	9175
2014	1342107	972277	8619	2019	1550031	837412	8983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2、农村衰退的走势不会变。农村衰退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是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的结果,其中,台湾因具有80%以上的城镇化率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城镇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尤其是农村人口持续下降和非农转移,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原有的传统农村产业、文化活动、聚落空间纹理、农村地域景观及农村社会特质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面临消解命运^[8],直接导致农村衰退。一方面,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时,随着农地非农利用经济价值的高或低和种植、养殖成本的日渐走高,非农化和粗放利用问题愈益突出,出售、流失、休耕甚至废弃更加普遍,“不期待子女传承”,“极易受经济诱因而贩卖土地或休耕的行为”。^[9]由农业和农村人口塑造的单一的用地结构很难维系,台湾

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农村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大量非农转移,既造成在地劳动力短缺,全年季节性加上常态性缺工超过 27 万人^[10],也使部分宅基地闲置、流失,在暴露出一定的空心化现象时,聚落形态、建筑风格等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昔日的模样。基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城乡差距的结构性矛盾,人力不足、人气不旺仍是台湾农村衰退的突出表现。

3、农村存在的矛盾不会变。台湾城乡差距尤其是城乡要素“乡→城”流动大于“城→乡”流动的态势,影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系列矛盾存在并加剧的根源。第一,因应于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需求,2001-2019年,台湾农业从业人员从 706 千人下降到 559 千人,减少 147 千人,耕地面积从 848743hm²下降到 790197hm²,减少 58546hm²,而向工业、服务业及城镇集聚,成为其中一部分。在未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其对生产总值贡献率不会发生明显调整和变化时,生产要素的非农转移不可抵挡。由于缺乏要素支撑,农村难以稳定发展。第二,台湾农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65 岁以上农村人口的比重占农村人口的 32.5%^[11],因应于到 2051 年岛内 65 岁以上人口将达 6880 千人、占总人口 36.9% 的预测^[12],农村人口的结构特征愈加明显,如,2017 年 65 岁以上农业就业人员达 96.3 千人,占农业就业人员总数的 11.3%,50-64 岁 248 千人,占 44.6%。^[13]故此,大龄、老龄农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第三,台湾工业对农村水土环境的污损集中表现在农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上,污染源为废水灌溉,在 2014 年底共有 4662 个地块,783hm²,90% 以上是水田^[14],造成“农地污染事件及农作物重金属含量超标事件频发”,并危及“土壤品质及农作物生产安全”^[15],虽经治理,但短期内无法解决。台湾畜禽养殖的污染物、废弃物已开始防治,但作为农业面源污染 COD 的主要来源,每头(只)畜禽每年排泄粪便中污染物 COD 含量分别为牛 248.2kg、猪 26.6kg、羊 4.4kg、鸡鸭 1.2kg^[16],因台湾居民肉类摄入量增加带来膳食结构变化,推动畜禽养殖发展,如,在 2019 年底,在养牛 150791 头、猪 5514211 头、羊 134789 头、鸡 98677 千只、鸭 8016 千只,一旦处理不当,将会造成污水、废水排入河流或地下水。台湾渔业养殖分浅海养殖、咸水养殖、淡水养殖等,面积至少在 4 万 hm² 以上,如 2019 年为 4.07 万 hm²^[17],部分从水田改成,因养殖需要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层下陷、海水倒灌、土壤碱化。这些因素叠加存在,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任重道远。第四,农村收入低于城市,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农业收入低于非农兼业收入,是台湾农村人地分离的根本原因。故此,实现在地在业增收成为农村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 变的方面

1、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围绕以休耕农地活化、生物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农业新典范”,以提升粮食自给率、通过整合品牌标章迈向健康无毒农业岛为目标的“农业安全体系”,以拓展岛内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为重点的“农业外销能力”^[18],科技创新、跨域整合将不断推动台湾农业利用和吸取新的经济发展要素,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将不断延伸或覆盖到台湾第一产业的每个领域,因为无论种植业的品种选育、栽培耕作、土壤品质、灌溉分离、农地规模、灾害防治,还是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流通、零售及产品的监控、认证、追溯、检验,都存在尚未触及和有待于继续完善的空间,通过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扩大生产型农业的规模,如,用 GIS 定位耕地,一个人能管理耕作农田 120hm²,而传统方式只能耕作 1hm² 甚至更少,而且可以延伸到非农业范畴,如,花卉产业除了种花、卖花,还涉及花器、培育介质、生物技术产品、储藏、运输等延伸产业。另一方面,智慧智能、旅游休闲、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将推动台湾农业跳出传统农林牧渔的业态,并与之融合和交叉,在“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农业增效添加新条件,为农业创新注入新活力,为农业发展集聚新动能,而使农业更趋于多样化和复合化,如,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提升附加价值的新亮点产业”,在围绕

“生态旅游”、“自然教育”、“文化创新”三大主题,挖掘农业景观的特质性和乡土性,使区域主题旅游、体验特色活动成为新热点时,为配合2019年地方创生元年计划,通过晒谷、风车等农事活动的食农教育,走入小镇漫游年。科技创新、跨域整合将使台湾农业竞争力继续保持排名世界第六位。^[19]

2、从农村发展的不同模式转变为“三位一体”的重构体系。农村衰退及其生态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经历的变化和主动或被动做出的反应,将促进台湾农村“生活-生产-生态”的综合提升或“空间-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以时序的演进性和内容的多维性为基础的。时序的演进性表现在台湾农村发展并非直线向前的,不同阶段各有明显特征和侧重点,经历了从营造农村新风貌、新农业运动阶段注重硬体建设、环境保护向农村再生初始阶段保存社区文化、发展社区产业的扩展,2017年进入农村再生2.0,重点规划“扩大多元参与”(在农村社区作为发展主轴外,鼓励地方“政府”、民间组织、NPO/NGO、企业、学校等不同行为体参与)、“强调创新合作”(科技、服务、跨域)、“推动友善农业”(有机、友善耕作制度)、“强化城乡合作”(食农教育、地产地销、重建乡土记忆、引导回流农村)四大主轴^[20],2019年以来又推动“创生”,由此可以预见,随外部条件变化和内部要素整合,有可能继续出现新的特征、侧重点甚至重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村在演化和重塑中的发展。内容的多维性表现在农村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维度,本文之所以把台湾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三个一级模式和七个二级模式,更多的是基于以农林牧渔产业培育为核心发展农村经济的考量,而非忽视其他两个维度。在台湾以发展农村经济为根本的未来实践中,同样涉及空间维度、社会维度。前者除为发展农业经济和非农经济提供空间场所、硬体设施、形成社区的差异性、承担农村尤其是城镇边缘地区生态修复及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的责任外,还包括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社福医疗等软体设施;后者涉及在地历史文化的保护、深耕及其创意,青壮年劳动力回乡引导、培训,农村人口由下而上参与社区自治等;即使经济维度也从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色”的特色产业趋向建设基于在地特色的农业集团产区,并开始注重农村小镇的带头作用。

总之,在台湾农村的“可变”中,台湾当局是着重通过资本和人口的要素加以推进的。前者表现在十年内预算投资2000亿元,鼓励产业进驻、文化创意;后者除用“培根计划”培训社造人才、引导年轻人回乡外,还鼓励城市人下乡,即从事农林牧渔产业,以至于在2019年底,此类公司达16551家,较之于2010年的7693家增长了8858家。^[21]当局干预之下资本、人口的反向流动,属于逆城镇化的现象,是台湾农村发展、城乡互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注释:

- [1] 张富刚、刘彦随:《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地理学报》,2008年第2期,第115-122页。
- [2] 冯健:《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模式与战略——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地理研究》,2005年第5期,第811-821页。
- [3] 刘自强、李静、鲁奇:《乡村空间地域系统的功能多元化与新农村发展模式》,《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年第5期,第532-536页。
- [4] 何安华、陈洁:《台湾粮食供给保障与宏观调控的经验及启示》,《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2期,第66-76页。
- [5] 项文惠:《台湾粮食安全的时空格局、保障政策及借鉴》,《台湾研究》,2019年第2期,第60-67页。
- [6] 周琼等:《台湾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与分析》,《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5年第11期,第1455-1462页。
- [7]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向“立法院”第六届第二会期报告的《业务报告》。
- [8] 廖淑容:《台湾乡村地区发展的社会资本评量:八个乡镇比较研究》,台湾《建筑与规划学报》,2014年第2、3期,第175-192页。
- [9] 廖慧怡:《基于〈里山倡议〉的乡村旅游发展途径初探——以台湾桃园地区对乡村旅游转型的需求为例》,《旅

游学刊》，2014年第6期，第76-86页。

[10] 张盼：《台湾农业缺工问题成“老大难”》，<http://tw.people.com.cn/GB/n1/2018/0427/c14657-29953249.html>，访问时间：2021-01-29。

[11] 杨志良：《配合农民健康保险，试办社区医疗保健方案》，台湾《公共卫生杂志》，1985年第9期，第63-66页。

[12] Commission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Population Projection of Taiwan Area, 2006 to 2051, 2006.

[13]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重要农业统计指标清单》。

[14] 付融冰：《台湾重金属污染防治制度研究》，《环境污染与防治》，2014年第6期，第84-95页。

[15]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灌溉水质保护方案》。

[16] 张晖：《中国畜牧业面源污染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55页。

[17]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19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第280、273页。

[18]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新农业创新推动方案》。

[19] 《中国台湾农业竞争力竟然排名世界第六位》，https://www.sohu.com/a/278218238_99915831，访问时间：2021-02-02。

[20] 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村再生2.0创造台湾农村的新价值》。

[21]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19年《“中华民国”统计年鉴》，第224页。

（责任编辑 胡石青）

Procedures, Patterns and Trends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s Rural Areas

Xiang Wenhui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d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e divided the development model into three first-level modes: outer force driven model, inner growth model,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model. Further, we subdivided these first-level models into seven second-level models: urban area expansion driven model, labor export and feeding back model, new and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land activation driven model, rural regenerative community model, the deep tourism manage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model and the organized rural market model.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 the pressur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trend of rural recession, the ‘stability’ of the rur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to ‘agri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mode into the ‘trinity’ reconstruction system, we analysed the trend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Key Words: Rural Taiwan; Development Pattern; Future Trends